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Julio Cortázar

BESTIARIO

动物寓言集

[阿根廷] 胡利奥·科塔萨尔 著 李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Julio Cortázar
BESTIARIO

动物寓言集

[阿根廷] 胡利奥·科塔萨尔 著 李 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055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动物寓言集/ (阿根廷) 科塔萨尔著; 李静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492-0

I. ①动… II. ①科… ②李…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阿根廷-现代 IV. ①I78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9246 号

JULIO CORTÁZAR

BESTIARIO

Copyright © Heirs of Julio Cortázar, 1951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 A.

All rights reserved.

特约策划: 彭 伦 姚云青

责任编辑: 杨晓明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动物寓言集

[阿根廷] 胡利奥·科塔萨尔 著 李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75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4.25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492-0

定价 16.00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

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

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柯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柯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柯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

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就也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

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

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味，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臂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代序：伴着爵士乐的曲调和自由

马努艾尔·文森特^①

他的腿太长，当不了自行车运动员。可是，他骑着一辆名叫“哈利路亚”的自行车徜徉在巴黎街头。巴黎正是清晨，街道刚洒完水，弥漫着羊角千层酥和热面包的香味。他过着学生的日子，却不是学生；他像在流亡，却不是流亡者；他确实拥有阿根廷国籍，并非飘零无根，却只认幻想文学、爵士乐、先锋派绘画、拳击和黑色电影这一个祖国，巴黎不过是个比喻，是个心灵坐标。如果说，作为阿根廷人意味着悲伤和远离，那么，胡利奥·科塔萨尔用自己的人生轨迹充分回应了这种模式。每位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和，去反驳。

一九一四年，他出生在布鲁塞尔。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阿根廷外交官，时任阿根廷驻比利时大使馆商务参赞。不久之后，父亲

^① 马努艾尔·文森特(1936—)：西班牙作家，著名专栏作家，长期供职于《国家报》。

扔下他们，离家出走。他的童年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部的班菲尔德度过的，青少年时期曾患病休养，饱读诗书，师范毕业后，在门多萨的库约大学任教。他高雅的精神世界与低俗的庇隆主义^①发生了碰撞，加上其他麻烦事：狂热地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内莉·马丁，外省的资产阶级拉出一道防疫线，将他隔离，当众拒绝亲吻塞拉费尼教皇使节的戒指，最终踏上了背井离乡的路。他准备好了，要告别这一切。

年轻的科塔萨尔认识了译员奥罗拉·贝尔纳德斯，她是加利西亚移民的女儿，后来成为他第一任妻子。一九五一年，科塔萨尔获法国政府奖学金，藉此定居巴黎。当时，他已经创作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受到博尔赫斯的大力褒奖，为后来的声名立下了根基。确实，他走得太远太远了。你可以想象他坐在拉丁区任何一家咖啡馆门前，遥想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距离，创作经典名著《跳房子》，尽情抒发内心的忧伤。也许，爵士乐大师们也走过那里。他们途经巴黎，在塞雷耶音乐厅演出大获成功、回路易斯安那饭店上床睡觉前，来塞纳街的小市场采购补充家中的威士忌。

《跳房子》便从这条街开始，奥利维拉沿街走到孔蒂码头的拱门下

① 庇隆主义的提出者是阿根廷总统庇隆和夫人艾薇塔。当时，阿根廷社会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致使庇隆主义推行的平等民主在阿根廷民间与政坛上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政治风暴。

去见玛伽。路易斯安那饭店，萨特和西蒙·波伏瓦，还有阿尔贝·加缪和朱丽叶·格莱戈^①曾经在那儿住过。如今，在它狭窄的电梯里，几位梦想成为伊夫—圣罗兰品牌模特的姑娘与迈尔斯·戴维斯^②、查理·帕克^③搅在一起。姑娘们很讨人喜欢，迈尔斯·戴维斯扛着小号，查理·帕克扛着萨克斯。

热爱科塔萨尔是整整一代人必须要做的事，认同他的人组成了一个团体。六十年代中期，他们惊讶地发现可以用西班牙语像爵士乐那样自由地写作，摒弃约定俗成，或者像杜尚那样，将日用品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用新的视角将它们点化为艺术品。一个带法国口音、将大舌音发成喉音的阿根廷人也会如此迷人。更何况，他多此一举地像罗杰·瓦迪姆^④那样戴着黑色玳瑁眼镜，一张五十年代索邦大学学生的脸，一缕头发遮住额头，正好配上翻领毛衣，照片上的他吹着小号，人如其文，难怪会给当时思想自由、想象力丰富的读者们造成精神毒害。没有哪个女孩读完《跳房子》后不去梦想成为玛伽。

-
- ① 朱丽叶·格莱戈(1927—)：法国歌手、演员，被誉为“存在主义者的缪斯”。
 - ② 迈尔斯·戴维斯(1926—1991)：美国爵士乐手，小号手。
 - ③ 查理·帕克(1920—1955)：美国爵士乐手，爵士史上最才华横溢的萨克斯手。
 - ④ 罗杰·瓦迪姆(1928—2000)：法国导演、制片人、演员。

一九八一年密特朗授予他法国国籍时，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的墙上出现了这样一条标语：“回来吧，胡利奥，有什么难的！”科塔萨尔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看望病重的母亲。他像陌生人那样在埃塞萨机场瞎逛，没有人接他。他从来没有被任何阿根廷政府承认过，接受过。如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帕勒莫区，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小广场，从那儿延伸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街，不远处，是一堵黑暗中杀害易装癖的行刑墙。

他也有过其他恋情。立陶宛人乌格涅·卡维丽丝逼他和奥罗拉离婚，并对他进行政治启蒙。从此，另一个科塔萨尔诞生了：从象牙塔坠落到地面，介入到失败的事业中，在宣言上签字，主持反对魏地拉^①和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的委员会，热爱萨尔瓦多·阿连德和尼加拉瓜的桑蒂诺主义^②。这种斗争态度和他的先锋派美学思想令左派读者欣喜若狂，也让他与一些意识形态至上的拉美老朋友、老同行们渐行渐远。后来，他对卡洛尔·邓洛普的恋情又让他踏上别的路，其中一条带他们前往另一个世界。卡洛尔因白血病，先行一

① 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1925—)：阿根廷政治人物，军人独裁者，1976—1981年间任阿根廷总统，上任后将整个国家置于军事管制下，通缉和捕杀反对派。他的总统任期以残酷镇压异己而臭名昭著。

② 桑蒂诺主义为尼加拉瓜政治派别，名称来源于1926—1933年发动反对美国武装干涉游击战争的奥古斯都·尼古拉斯·卡尔德隆·桑蒂诺。1961年，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从反政府组织发展为社会主义政党，1979—1990年间统治尼加拉瓜约12年。

步。两年后，科塔萨尔同患此病，步其后尘，随她而去。他一天天地衰老，没蓄胡子的脸庞渐渐恢复了孩子般的容貌，腿依然还是那么的长。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二日，科塔萨尔在萨拉扎尔医院去世。当时，加利西亚人奥罗拉·贝尔纳德斯已经回到他身旁，在病床边打地铺，陪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科塔萨尔与卡洛尔合葬于蒙帕纳斯墓地。崇拜者们去看他，总会在墓碑的祥云上放一杯葡萄酒和一张儿童街头游戏跳房子的图案，以示祭奠。没有奖项，没有勋章，没有院士头衔，没有庄重着装，他只带上了读者的热情，去了另一个世界。因为科塔萨尔，我们爱上了巴黎的自由、爱上了一些爱、一些人和一些秘密地点——详细单子一分钟就能列出——也爱上了所有骑自行车、车筐里放一根长棍面包和一本书的姑娘，也许她们就是玛伽。

（本文原载西班牙《国家报》2006年8月27日）

目录

001	代序：伴着爵士乐的曲调和自由
001	被占的宅子
008	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
020	远方的女人
033	公共汽车
046	剧烈头痛
062	奸诈的女人
082	天堂之门
099	动物寓言集

被占的宅子

我们喜欢这宅子，不单单因为它是老宅（如今，把老宅的材料拆了卖，能赚大钱），宽敞，也因为这里还记载着曾祖父母、祖父、父母和儿时的所有往事。

我和伊雷内习惯了两个人住，也执意就两个人住。做法是有些荒唐，这宅子住八个人也不挤。我们七点起床，上午打扫卫生。十一点左右，伊雷内清扫最后几间屋子，我去厨房做饭。中午，我们准点开饭。除了几个脏盘子要洗，没别的事了。宅子又大又静，完全靠我们俩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想到这些，午饭便吃得格外香甜。有时，我们甚至觉得之所以没结婚，完全因为这宅子。伊雷内随随便便地回绝了两个追求者，而我和玛利亚·艾斯特还没订婚，她就撒手人寰，舍我而去。年过四旬，我们心中都有一个隐忍不发的想法：曾祖父母在老宅里开始的传宗接代该由我们简单无声的兄妹通婚宣告结束。总有一天，我们会死在这里，游手好闲、不易亲近的堂表兄妹们会接手这宅子，将它推倒，靠地皮和砖头发大财。

要不，干脆我们自己早点下手，堂堂正正地掀倒它了事。

伊雷内天生不烦人。除了做早上那些工作以外，她整天坐在房间沙发上织毛衣。搞不懂她怎么有那么多可织的。女人织毛衣，在我看来，不过是无事找事做的借口。伊雷内不是这样，她织的东西总能用得着：冬天穿的毛衣、我的长筒毛袜、她的披肩和坎肩。有时，她织完一件坎肩，哪儿不如意，又一下子全拆掉。毛线球不甘心几小时就没了原来的形状，不安分地在毛线筐里跳来跳去，看着着实有趣。每周六，我去市中心替伊雷内买毛线。她相信我的眼光，我挑的颜色她都喜欢，从来不用拿回去退。我总是趁买毛线的工夫顺便去书店转一圈，问问有没有进法国文学的新书。问了也白问，打一九三九年起，阿根廷再也没进过好东西。

不过，我想谈的是宅子，谈宅子，谈伊雷内，因为我自己无足轻重。我问自己：如果不织毛衣，伊雷内会做什么？书可以一读再读，可圆领毛衣要是一织再织，不可能不遭非议。一天，我发现五斗橱最下面的抽屉里放满了三角披肩，白色的、绿色的、淡紫色的，一块块像针织店里那样叠得整整齐齐，旁边还放了樟脑丸。我不敢问伊雷内织这么多三角披肩干什么。我们不需要挣钱糊口，乡下每个月都送钱来，钱越攒越多。伊雷内只爱织毛衣，她技术高超，手法娴熟，满手银针活像两只白色的刺猬，银针上下舞动，地上放着一两只毛线筐，毛线球在筐里跳个不停。我一看几个钟头，